

學術論文

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 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

The Keynote of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and Its Perception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in Hu Jintao Era

朴炳光 *Byung-Kwang Park*
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基礎與對北韓核武問題認知的變化。研究結果是中國對北韓政策基礎可整理為以下四大方面：第一、維持北韓體制的穩定；第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和朝鮮半島無核化；第三、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第四、引導北韓走向改革開放。除此之外，雖然中國在面對兩次北韓核子試驗等核武問題的過程中，對北韓認知產生變化，但並未形成有意義的「政策變化」。所以南韓政府需要突破中國對北韓認知變化的「臨界點」，在促成中國對北韓政策變化中，尋求更為積極的戰略性角色。

This paper aims to drawing China's North Korean policy keynotes and

perceptions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s in the Hu Jintao Era. The main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four keynotes of China's North Korean policy: firstly, keeping the stability of North Korean political system; secondly, 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s; thirdly, maintaining influence toward North Korea; and fourthly, inducing North Korea to "open door policy". And through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experiment, China's perception toward North Korea has seems changed, but it has still not reflected on meaningful policy.

關鍵字：中朝關係、核子問題、北韓政策、認知變化、臨界點

Keywords: China-North Korean Relations, Nuclear Issue, North Korean Policy, Perception Change, Brinkmanship

壹、前言

中國胡錦濤政府的上台和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的發生雖然是偶然，發生時間卻一致。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是 2002 年 10 月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詹姆士·凱利訪問北韓時，北韓承認利用高濃縮鈾開發核武器而開始的。在此之後不到一個月，中國第十六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後，胡錦濤政府成立。因此，在胡錦濤執政期間，北核問題成爲外交工作中一個最頭疼、最敏感的問題，也成爲中國對北韓政策的試金石。

胡錦濤政府的上台使很多專家期待中朝關係可能發生變化。鄧小平死後，北韓、中關係已經轉變爲根據事件的不同選擇性合作的「戰略性合作關係」，¹以領導層改組爲契機這種變化將加速轉變。尤其以胡錦濤爲中心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上台，是使北韓與中國從過去的共同理念轉向以現實爲基礎的利益關係的可能要素。

事實上胡錦濤政府開始強調與北韓不是黨對黨的特殊關係，而是國家對國家的「正常外交關係」，這與北韓認爲傳統中朝關係的特殊性是不同的。²對於北韓核武問題，中國也開始擺脫過去單方面包庇北韓的態度，中國在第二次核武危機出現後，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提出的朝核決議案，並在 2003 年 2 月將北韓核武問題列入聯合國安理會協商主題時投了贊成票。之後中國對北韓的第一、二次核子試驗直接的表達了憤怒和失望，³並在聯合國對北韓制裁決議案中投了贊成票。不僅如此，中國還採取中斷與北韓的金融關係和原油供給等限制措施，將國際社會的決議付諸行動。這

¹ 中國與北韓間的「戰略性合作關係」是指中國將與北韓國家存亡有關的問題看作自身的根本利益積極處理，但對於其他問題則選擇性合作或支援的關係。

² 典型事例是 2003 年 3 月胡錦濤就任國家主席以後，同年 4 月趙明錄訪問北京時敘述的中朝關係「穿過鮮血和槍彈的朝鮮與中國」和胡錦濤的「傳統友好關係」形成鮮明對比。

³ 北韓核子試驗以後中國外交部最先聲明「北韓無視國際社會的廣泛反對，悍然進行核子試驗，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的立場」，中國政府使用的「悍然」一詞是冷戰時期對敵對國家的用語。

與過去中國一貫反對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制裁和譴責比起來，毫無疑問是令人驚訝的變化。

儘管如此，北韓核武問題仍是現在進行式，而且在過去 8 年，不同的評論者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持懷疑和不信任的立場，亦即比起根本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中國更關心利用這個問題來培養自身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事實上中國對北韓的政策和對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在持續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是僅限於對北韓核武問題短期戰術性的變化，還是意味著至此中國對北韓政策全面性戰略的轉換，是相當模糊的。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中絕對不能忽視的核心變數依然是中國的角色和影響其北韓政策的因素。每當北韓核武問題陷入膠著狀態，中國在打破這個僵局時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未來，中國的這種角色和對北韓政策基礎不僅在北韓核武問題，甚至在全面中朝關係中也不得不受到重視。所以本文主要是整理胡錦濤政府上台以後，中國採取的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基礎，並考察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認知是如何變化。由此在結論中提出今後中朝關係變化的可能性和展望。

貳、胡錦濤政府的對外戰略基礎

爲了理解中國的北韓政策和中朝關係的變化，首先需要把握與中國的對外政策有關的動向。因爲北韓核武問題和中朝關係對中國的價值和意義，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其自身的對外戰略和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角色的要求，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變化有著深入的關聯。

中國把 2050 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定爲長期目標，把 2020 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設爲中期目標。爲了這些目標在過去三十年間致力於通過改革開放來發展經濟，並爲了經濟持續成長，重視打造內外安定的環境。並且中國爲了將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的影響最小化，將通過擴大內需來恢復經濟和安定民生定爲 2010 年經濟政策的最優先目標。並且這種當

前問題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也忠實的反映出來。⁴三十多年來，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大大增加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外交影響力，中國以此為基礎，持續推動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大國的渴望。只是中國不希望在對外關係中因中國的大國化戰略造成「中國威脅論」等負面效應，所以中國傾力提高「國際秩序的民主化」或「負責任大國」以及「和平形象」。具體地說，中國的戰略基礎通過「多極化」、「和平崛起」、「責任大國」、「大國外交」、「和諧世界」等多種修辭表現出來。並且這些言論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上台以後更為流行。

中國改革開放後追求國際秩序的多極化，並通過強化「綜合國力」成為世界體制中的「一極」的目標。早在1990年代初，鄧小平就曾談到「多極化論」，並認為「中國已經是國際秩序中的一極」。⁵然而此點根據論者不同而有討論的空間，很難否定這是因缺少國際社會確切認識的空虛吶喊。所以中國在1990年代將多極化定為對外戰略的主要目標，並為此著重於通過外交手段調整大國關係。以這些努力為基礎，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改善多極化的環境，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國際公認的一極。

中國以改革開放實現的經濟發展成果和自信心為基礎，勾勒二十一世紀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責任大國」角色的藍圖。1990年代起出現的「責任大國論」體現了與中國追求的「一極」不同的另一個層面，將自身假定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雖然當初責任大國論是以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為意圖而出現，但如今二十一世紀在國際社會中，責任大國論可理解為中國通過承擔和發揮多種國際角色和作用，確保作為真正「大國」的支撐。只是在國際社會中，中國雖然在履行作為「責任大國」的角色和義務方面達成了基本協議，但在成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還是世界大國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異

⁴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2010年3月5日至14日)中也批准了與之相同內容的經濟政策為重點的政府計畫案，中國國務院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參照以下的網站。

⁵ 〈國際形勢與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3。

議。⁶ 顯而易見地，從 1990 年代後期，中國開始靈活運用自身的國際地位擴大影響力，積極介入東亞地區問題，試圖作為責任大國，為地區共同繁榮和加強安全作出貢獻。與此相關，中國在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和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時，不僅抵擋住人民幣貶值的誘惑，更對東亞國家進行金融援助。並在 2002 年冬天被視為東亞最大安全危機的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後，與 1993 年第一次朝核危機發生時不同，在解決核武問題上扮演積極的仲裁者角色。通過這些行動，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將自身打造為大國形象並謀求擴大作為責任大國的角色、能力以及活動空間。

江澤民時期強調的多極化、責任大國外交等在胡錦濤政府上台以後升級、發展為「和平發展論」與「和諧世界論」的新外交理念。尤其和諧世界論為胡錦濤新統治理念「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的對外觀念，主張建設長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⁷ 中國強調建立國內「和諧社會」，周邊的「和諧亞洲」，國際的「和諧世界」。

「和諧世界論」在 2008 年下半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後更具有彈性。中國在管理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維持與美國的穩定關係，同時也將其當作提升自身地位和可以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發言權和角色的機會。中國認為美國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基礎的脆弱性，並且認為超強大國的地位必將遭受一定程度的打擊。然而中國想要改變當今國際秩序「一超多強」的格局仍然力有未逮，美國發展出進步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準、產業結構的尖端化、強大的軍事力量和 GDP 的比重等都是最好的證明。⁸ 最終，中國認知在未來相當的時間，美國仍會

⁶ 唐世平、張蘊嶺，〈中國的地區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6 期(2004 年)，頁 8-13。

⁷ 2005 年 4 月亞洲、非洲高峰會議和 9 月聯合國六十周年高峰會議中胡錦濤公開談及以後，黨、政領導層逐漸開始強調建設和諧世界，2007 年 3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從而確立了新外交理念的地位。

⁸ 邵峰，〈金融危機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及中國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2 期(2008 年)，頁 23-26；袁鵬，〈金融危機與美國經濟霸權：歷史與政治的解毒〉，《現代國際關係》，第 5 期(2009 年)，頁 1-6。

維持在國際秩序中的優勢地位，並暗示這種認知使中國在短期內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本國對外戰略的基礎。

儘管如此，中國對於最近國際形勢的認知和政策基礎，使中國在世界性問題中不再停留於守勢和被動的態度，嘗試比以前更積極和主導的外交方式。例如，中國雖然沒有積極的接受美國提出的「G2」，但將全球金融危機視為自身崛起和推進國際社會中「利害關係人」的機會，逐漸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那麼今後中國這樣的意圖在解決包括北核問題在內的朝鮮半島問題的過程中究竟能否適用，是韓國不得不重視的關鍵。

參、胡錦濤政府的北韓政策基礎

目前為止，根據中國政府對北韓認識和政策基礎相關的正式表明的外交辭，中國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內容有中國重視與北韓的「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繼承「十六字方針」，⁹ 在「政府指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原則下增進中朝的經濟合作關係。¹⁰ 中國與過去支持合理減輕北韓的安全擔憂和社會主義建設與自主和平統一與對話，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北韓和平利用核武器的權利相反，對於北韓擁有核武器和退出六方會談明確的表明反對的立場。¹¹ 考慮中國的這種立場和對外戰略以及朝鮮半島政策，中國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基礎可以整理為以下四方面。

一、維護北韓體制的穩定

胡錦濤政府定位的北韓政策核心基礎是「北韓體制的穩定」，中國認

⁹ 中國對北韓的「十六字方針」是2001年9月江澤民訪問北韓時，在與金正日的高峰會談中提出，內容包括兩國間「繼承傳統，面向未來，善鄰友好，加強合作」。《人民日報》，2001年9月4日。

¹⁰ 中朝經濟合作的十二字原則是2006年1月金正日訪中時溫家寶總理提出的。《人民日報》，2006年1月19日。

¹¹ 全炳坤，〈北核問題的解決方向：中國的立場〉，《2009年韓國國際政治學會學術大會例會發表文集》，2009年12月12日。

識到北韓體制的崩潰是關係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中國尋求防止北韓崩潰是因為隨之引起的朝鮮半島不穩定將直接對中國持續穩定發展經濟的國家目標造成最大影響。如果經濟停止增長，那麼中國內部存在的因貧富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失業和貪污腐敗等產生的矛盾和不滿將無法抑制的暴露出來，甚至不排除陷入分裂和混亂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中國擔心北韓體制混亂和崩潰導致的大規模難民流入，根據北韓崩潰前後情況不同而可能發生的內戰，偶發、局部性的對南韓武裝挑釁，國際介入而發生的武裝衝突等不利影響。所以，中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反對北韓崩潰。¹²

此外，在軍事、安全方面中國也不得不積極支持北韓的經濟穩定和維護北韓體制。因為中國將北韓視為與自身安保直接相關的軍事地理緩衝地帶，中國的戰略專家稱中國 1950 年參加韓戰的意圖亦在於不失去緩衝地帶。中國傳統上就將北韓看作一種「戰略資產」，為了維護這份資產必須防止北韓體制崩潰。與其說是由於和北韓特殊的兩者關係，倒不如說是因為從戰略利害關係角度需要北韓作為中、美間的「緩衝地帶」而存在。¹³

後冷戰時期以來國際局勢的巨變，北韓作為「戰略性緩衝地帶」的意義和角色亦發生變化。中國內部對北韓的非正常行為表現出強烈不滿，認為北韓妨礙中國國家利益的專家也不少，並且察覺到中朝關係已發生變化，然而就連視北韓為「戰略負擔」的專家也承認，就中國立場而言，北韓的戰略價值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脈絡中，第二次朝核危機之後，中國不能對北韓在面臨國際孤立和經濟困難加劇的情況下，產生體制崩潰危機坐視不理，並試圖通過經濟交流與合作的方式，維護北韓的穩定和社會主義體制。

¹² 對於北韓崩潰和劇變事態中國的立場和對策，參照朴炳光，〈北韓劇變事態與中國〉，《東亞簡報》，第 3 卷第 4 號(2008 年)，頁 107-112；朴昌熙，〈北韓劇變事態和中國軍事介入展望〉，《國家戰略》，第 16 卷第 1 號(2010 年)，頁 34-59。

¹³ 陳峰君，〈21 世紀朝鮮半島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國際政治研究》，第 4 期(2001 年)，頁 7-9；李英明，〈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與中國安全〉，《時政點評》，第 3 期(2006 年)，頁 40-43。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中國謀求的是與其友好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北韓的穩定和持續存在，沒有必要將其與金正日政權的持續存在同等看待。所以，萬一北韓在沒有外部勢力的介入，而因內部勢力的權力鬥爭而出現政權交替，中國對此沒有介入或反對的話，不論是誰掌握政權，「體制的穩定」都是最先考慮的因素。¹⁴

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朝鮮半島無核化

胡錦濤政府的北韓政策以解決核武問題和朝鮮半島無核化為主要內容。胡錦濤上台以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途徑，其核心為所謂「朝核三原則」，其一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其二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其三，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為基礎。¹⁵ 中國通過解決北核問題，以朝鮮半島無核化作為政策的核心，因為北韓核武問題造成的朝鮮半島緊張局面在根本上違背中國朝鮮半島政策的最優先目標，即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不僅如此，中國擔心核武擴散最終對中國的安全也會構成直接威脅。¹⁶

如果中國擱置北韓核武問題，不僅地區內安全面臨嚴重挑戰，甚至這個禍根會為美國勢力在東北亞擴散提供契機，從而無法避免與美國的直接對立。如果北韓持有核武，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唯一與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北韓等四個擁有核武國家接壤的國家，萬一中朝關係惡化，北韓的核武也可能成為威脅中國的手段。不僅如此，中國擔心北韓體制崩潰導致對核武器控制力下降，北韓核武器或核物質落到與中國國內分裂主義者手

¹⁴ 這種視角在 CSIS 和 USIP 相關者的中國專家採訪中也出現了。Bonnie Glaser et. al., "Keeping an Eye on an Unruly Neighbor," *USIP and CSIS Joint Working Paper* (Jan 2008), p.19。

¹⁵ 中國的這個基本原則是 2003 年 3 月 18 日布希總統與胡錦濤通話時在討論北核問題的過程中首次公開。《人民日報》，2003 年 3 月 19 日。

¹⁶ 對於北韓核武問題中國的基本認識和政策，請參照文興浩，〈對於北核問題中國的基本認識和政策基礎〉，《中蘇研究》，第 27 卷第 3 號(2003 年)，頁 99-116；朴炳光，〈對於北核問題中國的立場和政策〉，《東亞研究》，第 46 卷(2004 年)，頁 139-164；全秉坤，〈中國的北核問題認識和中北關係的變化〉，《中國研究》，第 35 卷(2006 年)。

中，因此這也是中國強調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原因。¹⁷ 所以中國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在六方會談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在具體的政策執行階段不僅不斷說服北韓，還採取了政治、經濟壓力並行的戰術。

然而最終中國這種無核化的政策目標由於北韓兩次進行核子試驗沒有取得積極成果。反而北韓核子試驗之後，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參與制裁北韓和作為責任大國採取更積極行動等，中國面臨國內外的壓力。儘管如此，中國仍反對進行軍事介入或強力制裁北韓，並且堅持「制裁北韓不是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目的，只是手段」的立場。¹⁸ 中國通過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以朝鮮半島無核化作為北韓政策的基礎的同時，堅持這種立場不僅是因為中國認為制裁或壓迫不可能使北韓的核政策有所變化，而且擔心激起北韓的極端舉措或導致北韓政權崩潰，反而造成更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局面。¹⁹ 中國的北韓政策具有複雜性，在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同時，北韓體制的穩定和中國的安全相關。所以中國對北韓體制崩潰和朝鮮半島局面發展的評估可以作為中國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政策選擇的重要參考。這暗示為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如果朝鮮半島局勢朝向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或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任何措施都將從政策選擇中被排除。因為對中國來說，最優先考慮的朝鮮半島利益是「朝鮮半島的穩定」，而不是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

三、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

胡錦濤政府定位的北韓政策的另一個主要基礎是維護對北韓的影響力。中國想要通過強化在包括北韓在內的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創造在東亞

¹⁷ 文興浩，〈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的對北韓認識和政策〉，《中蘇研究》，第33卷第2期(2009年)，頁28；全秉坤，〈北核問題的解決方向：中國的立場〉。

¹⁸ 中國政府的這種立場從第一次北韓核子試驗之後，外交部發言人在定期記者會上發表以後，至今都仍然保持，沒有改變。

¹⁹ 龔克瑜，〈中國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國家利益、作用和前瞻性思考〉，《國際觀察》，第5期(2008年)，頁59-61。

區域內第一個「責任大國」的國家形象和角色。尤其胡錦濤執政後，中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致力於擴大國際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包含北韓在內的朝鮮半島是中國擴大影響力的據點，同時也具有一種跳板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使國際社會深切認識到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國是唯一可以控制北韓的國家，隱約有炫耀對北韓的國際影響力的意味。並且為此中國在 2002 年第二次朝核危機發生以後，擺脫過去觀望和消極姿態，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致力於促成六方會談等，發揮積極的作用。²⁰

但中國的這種意圖因為北韓實行核子試驗，六方會談陷入長期膠著狀態，使國際社會質疑作為「清道夫」的中國的「意志」和「能力」。儘管北韓進行了核子試驗，實際上中國仍具備對北韓的強大的影響力。眾所周知，北韓的原油和糧食等所謂戰略物資都依賴中國，並且中國不僅是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北韓消費市場上流通 80% 以上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中國生產的商品。²¹中國也很清楚這個事實，並以不引起北韓反抗的方式，盡可能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但有趣的是中國進行對北韓政策的過程中，北韓核子試驗以後中國更致力於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北韓核武問題越惡化，中國對喪失對北韓影響力的反應就越敏感，因為維護中朝關係是尖銳的戰略利益問題，但從過去經驗，中國的強硬態度只在北韓強制進行核子試驗等時機。2006 年 7 月北韓發射導彈以後，中國對北韓導彈發射公開表示嚴重擔憂，並支持通過日本主導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1695 號），甚至在 9 月暫時限制對北韓之原油供給。²²然而結果與中國預料的不同，中朝關係嚴重惡化，北韓堅

²⁰ 中國在第一次北核危機當時對北核問題雖然也十分關心，但當時第一，中國因為天安門事件後遺症還沒有從國際孤立狀態中完全脫離出來等，介入國際問題，能夠支付作為大國形象費用的餘力不足；第二，與美國積極堅持的「多邊解決方式」的第二次朝核危機不同，第一次北核危機當時，用就連南韓都被排除在外的北韓、美兩者解決方式進行，中國的介入餘地非常有限。朴炳光，〈對於北核問題中國的立場和政策〉，頁 146。

²¹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 and North Korea: Comrades Forever?" *Asia Report*, No. 112 (2006), p.ii.

²²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對北貿易資料，中國因為發射導彈(2006 年 7 月 5 日)與北韓的關係

決實行核子試驗使北韓核武問題引起的事態更加嚴重。因為這樣，中國不僅喪失了對北韓的影響力，嘗到中朝關係陷入危機的苦果，甚至在國際社會中遭受盡失顏面的侮辱。所以中國再次讓北韓陷入困境不僅對自身不利，對國際社會以制裁為手段的行動究竟能否取得成果仍然持疑惑態度。

首先，中國希望將北韓置於自身的影響範圍內，從而使北韓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更加依賴。中國的這種努力經過兩國最高領導層的溝通交流，通過強化人際紐帶、恢復信賴以及經濟交流、合作以強化相互聯繫等。如去年（2009）10月溫家寶總理訪北韓是為強化對北韓內外的影響力。²³ 中國將溫家寶訪北韓做為再次強化主導六方會談等中國作為北核清道夫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的契機。事實上，中國通過溫家寶訪北韓，從金正日得到關於「重開六方會談」的承諾以滿足國際期待，並且鞏固中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過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之前高呼六方會談永遠結束的金正日在與溫家寶總理的會談中談到，朝鮮半島無核化是金日成的遺訓，並且可以有條件的回歸六方會談，這彰顯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並且取得加強中國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的主導地位的成果。²⁴

四、引導北韓改革開放

胡錦濤政府的北韓政策核心基礎是引導北韓進行改革開放和確立經濟合作，中國數次間接或直接說服和敦促北韓進行改革開放。例如胡錦濤2005年10月訪問平壤時，具體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經成果，並且間接敦促北韓實行改革開放。²⁵ 北韓從過去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修正主

中斷2個月後的9月中旬停止對北韓供給原油，然而反而在進入10月後，儘管北韓進行了核子試驗，仍然向北韓供給了5萬8千685噸原油。《聯合新聞》，2006年11月27日。

²³ 朴炳光，〈溫家寶總理訪北和北中關係〉，《國際問題》（2009年11月），頁17-25；李東律，〈溫家寶總理訪問北韓和北中關係〉，《形勢與政策》，（2009年11月），頁13-16。

²⁴ 中國不願最近因「天安艦沉沒事件」南北關係緊張和國際社會的對北輿論接受金正日訪中的行為，仍然反應了中國維護對北影響力的意圖。

²⁵ 〈在金正日總書記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10月29日。

義乃至背棄社會主義的立場中轉變，如今肯定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想要學習。這種變化可以說是這期間中國對北韓政策十分謹慎，並且使北韓最高領導層逐步認識到改革開放之不可迴避的結果。但最近金正日訪中時，溫家寶總理破例直接向金委員長「傳授改革開放的經驗」，這可說是反應中國加強期望北韓政策變化的意志。²⁶

另一方面，中國在對北韓最高領導層進行直接或間接勸誘改革開放的同時，通過擴大與北韓的貿易等經濟交流與合作，引導北韓自然而然的接觸外部世界並接受國際社會的變化和趨勢。在此過程中，中國以「互惠合作，共同發展」原則和「政府引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的方針²⁷為基礎，通過與北韓的貿易和投資等發展經濟合作。結果在第二次北核危機以後，中朝間的貿易額不斷增加，2008年兩國間貿易額達到27億8千萬美元，使北韓對中國貿易依存度超過70%（包括南北韓貿易則為55%）。北韓對中國依賴雖然亦發嚴峻，中朝經濟合作擴大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仍能促進北韓經濟朝向市場化，國際局勢和世界經濟的趨勢對其進行直接或間接教育的效果是值得期待的。並且使北韓追求經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誘導其為改革開放形成有利的條件。²⁸

中國認為，防止北韓崩潰和擴大影響力最現實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經濟交流的戰略性判斷。就像部分人主張，中國想在維持朝鮮半島分離狀態的同時，追求北韓改革開放和擴大經濟交流的行為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換句話說，萬一北韓通過改革開放進入國際社會並推動經濟改革，那麼最終將導致南北緊張關係緩和、經濟合作擴大、統一可能性增加，這與中國希望維持朝鮮半島分離狀態和膠著化的目的具有政策性矛盾。

²⁶ 今年5月金正日訪中時，在會談中溫家寶總理向金委員長直接提出中國將積極支援北韓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並希望向北韓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經驗。《新華通信》，2010年5月7日。但北韓認為這是對改變政策的壓力，因此沒有報導。

²⁷ 〈胡錦濤同金正日舉行會談〉，《人民日報》，2006年1月19日。

²⁸ 崔秀永，《北韓、中國經濟關係擴大和對應方案》（首爾：統一研究院，2007年），頁75-77。

肆、中國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識

中國對北韓核武問題的主流認知是在北韓核武問題期間逐漸變化的。而其轉捩點是北韓的核子試驗，所以有必要將其分為前後期分段加以論析。²⁹

一、核子試驗之前中國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認知

2002 年秋天北韓核武問題再次爆發，中國積極調解促成六方會談體制正常運作時期，中國的觀點和立場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北韓需要核武是出自於提升民族自尊心和獲得國際認同的意圖，所以可望用對話和妥協的方式解決，毋須對此產生擔心和憂慮。³⁰ 另一方面，一個具核武的鄰國不僅對中國，並且對東北亞的穩定與和平也是嚴重威脅，並且可能成為美國加強導彈防禦體系的藉口，所以需要中國政府積極的應對。³¹

雖然中國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觀點分成這兩方面，但中國的大部分學者認為，對於北韓核武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美國的責任更大，布希政府上台時不僅對北韓進行全面壓迫，尤其在 911 恐怖事件以後將北韓定為「邪惡軸心」，並將其作為優先處理對象，而且毫無差別的聲討北韓體制及領導人，從而使北韓加快開發核武的步伐。專家的這種見解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政府的立場有共同之處，最終對北韓開發核武的意圖從心情上表示理解。並且中國認為，只通過其對北韓的單方面施壓解決核武問題是困難的，且對北韓所處的立場，即被大國包圍的孤獨感和對美國單獨先發制人

²⁹ 先行研究請參見申相真，〈中國對北韓的認識變化研究：北韓專家深入對話調查〉，《統一政策研究》，第 17 卷第 1 號(2008 年)，頁 265-291。

³⁰ 于美華，〈對話是解決超核問題的最佳途徑〉，《論壇通訊》，第 1 期(2003 年)，頁 26-28。這種觀點在被稱為「傳統派」的中國國策研究機關所屬韓半島專家和朝鮮族學者中能夠找到，金熙德、朴建一、戚保良、于美華、虞少華等為代表人物。

³¹ 時般弘，〈美國國家導彈防禦計畫與中國的對策〉，《中國外交》，第 7 期(2007 年)，頁 47-51。這種觀點在被稱為「國際派」的中國國內的安全專家和國際政治學者中更容易發現時般弘、沈驥如、朱峰為代表人物。

的攻擊產生警惕，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所共鳴。³²

中國即使在朝核危機再次上演時，都認為北韓為確保其體制安全搬出核武作為防禦性手段。³³ 中國考慮到北韓面對的經濟落後情況，認為通過傳統武器開發不能確保安全，所以開發核武和導彈是為了確保其基本安全不得不為的選項。所以中國堅持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必須朝改善北韓安全脆弱性的方向理解的立場。因此中國在與外國元首討論北韓核武問題時，毫無顧慮的強調對北韓的「體制保障」和「消除其對安全的擔憂」。³⁴ 並且中國認為美國高估北韓核武的威脅，並拒斥經濟制裁或軍事措施和政權交替等外部壓迫政策。

然而中國開始擔心北韓逐步升高核緊張和運用懸崖戰術，並開始更謹慎的估計北韓的核開發對中國的安保利益造成的衝擊。北韓在六方會談中多次表示他們擁有核武，已差不多完成廢燃料棒再處理，生產充分的武器級鈾供製造 5-6 個核彈，並多次提到將證明並顯示物理上的核武能力。而且北韓拒絕六方會談，並通過「持有核武宣言」和「導彈發射實驗」等使朝鮮半島的不安持續高漲。如此下去，北韓的衝動及強硬態度將使中國充分失望，因為中國認為北韓的挑釁發言或伺機使危機高漲的行動不僅使努力調解的中國顏面盡失，而且使朝核危機可能走上與中國意圖相反的另一個方向。

在朝核危機高漲的同時，中國的一部分相關研究所和安全問題專家開始考慮北韓實際持有核武的可能性，並且公開表示對北韓的批判。³⁵這些

³² 中國因為過去長久以來擁有從美國方面受到嚴重的核武器威脅的經驗，所以對北韓的核武器開發動機有同情的一面。

³³ 張建塊，〈送走切尼，迎來金正日：判讀北韓核武問題走向〉，《世界知識》，第2期(2004年)，頁9。

³⁴ 例如，胡錦濤與普京總統 2003 年高峰會談發表的「中、俄共同聲明」和同年與盧武鉉總統的高峰會談後發表的「韓、中共同聲明」中都能找到依據。

³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沈驥如認為，即使廢除中朝同盟條約也必須阻止北韓開發核武器，天津社會科學院的王忠文也將對金正日領導體制和北韓的公開批判內容刊登在有名的學術雜誌上。沈驥如，〈維護東北亞安全的當務之急：制止北韓核武問題上的危險〉，《世

專家開始懷疑北韓試圖超越運用發展核武作為確保體制安全的嚇阻和協商籌碼，最終通過強制開發和持有核武尋求「絕對安全」的雙重策略。所以中國部分專家開始認為，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只靠外交努力是有限的，必須考慮作為補充手段的經濟和其他壓迫手段。甚至還有一部分學者主張北韓政權的崩潰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對中國國家利益反而有幫助。³⁶

另一方面，在朝核危機深化的同時，中國政府內部也開始對北韓核武問題和中朝關係進行更多討論。外交部和商務部認為如果有必要迴避國際社會對中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中的角色和責任的分擔有過度期待，為此需要保持與平壤的距離。相反的，黨和軍部則強調與北韓傳統的「血脈關係」，並提出在戰略的角度北韓仍是一個不能擱置的存在。³⁷

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以後，中國內部以學界和政府為中心對關於北韓的「戰略負擔論」和「戰略信心論」得不到清晰的結論，並產生多種不同觀點。有趣的是，在這些爭論中，幾乎沒有朝鮮半島專家或安全專家預測到北韓將真的進行核子試驗。³⁸ 也就是說中國在北韓的核開發實驗對東北亞局勢的影響和中朝關係方面雖有深刻的思考，但一直抱持著通過對話和妥協使北韓放棄核開發的希望。

二、核子試驗後的北韓核武問題認知

北韓兩次核子試驗使中國直接表現出「憤怒」和「失望」。如果說第一次核子試驗（2006年10月9日）當時，主要是以外交部為中心的中國政府和專家們表現出對北韓的失望和憤怒，那第二次核子試驗（2009年5

界經濟與政治》，第9期(2003年)；王忠文，〈從新的角度密切關注朝鮮問題與東北亞局勢〉，《戰略與管理》，第4期(2004年)。

³⁶ 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早就提出了「南韓主導的統一政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將從美日向中國傾斜，所以北韓的崩潰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並非一定是損害」的主張。John Promft, "As Talks Begin, China Views North Korea as Risk,"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7, 2003.

³⁷ You Ji, "Understanding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China Brief*, Vol.4, No.5 (2004).

³⁸ 中國國務院所屬研究機關的朝鮮半島問題專家訪談，2006年10月25日。

月 25 日) 以後, 在一般民眾之間不滿和反感也明顯開始擴散。尤其以網路論壇為中心對北韓的批判輿論開始迅速擴散, 認為北韓核子試驗是對中國的「背叛」, 並且將北韓說成「流氓」的侮辱言辭的例子也不少。³⁹

另一方面, 就中國立場而言, 北韓核子試驗使中國在北韓核武問題和中朝關係上進退維谷。因為中國一直同時追求「朝鮮半島無核化」和維持「中朝合作關係」兩個目標, 但北韓進行核子試驗, 使這兩個目標變的難以並存。北韓兩次核子試驗後,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中國積極參與制裁北韓, 中國內部也開始擔心北韓不只將核武開發作為協商籌碼, 而是實際追求核武持有國的地位。結果以向胡錦濤提出國際問題諫言而著名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也預測「如今的事實是, 北韓已經通過兩次核子試驗持有核武器, 並且持有核武的立場不會改變。」⁴⁰ 同時也有另一部分學者們認為北韓最終覬覦的是得到事實上的核武器持有國地位的認可, 並且同時達成北美關係正常化和得到經濟援助。⁴¹

回顧過去, 中國雖然用強烈語氣對 2006 年 10 月北韓的第一次核子試驗表示批判, 但之後達成 213 協議, 美朝關係似乎也有所改善, 中國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仍存在一絲期待。尤其李明博政府上台以後, 北韓認為南北關係停滯的責任在於南韓政府的北韓政策, 中國同意北韓這一主張, 並致力於恢復與北韓的關係。並且對於中國而言, 要戰勝 2008 年下半年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浪潮, 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就更加重要。所以中國在迎接中朝建交六十周年時(2009 年) 強調「中朝友好年」, 並積極交換兩方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和重開六方會談的意見。

然而 2009 年 5 月, 北韓第二次核子試驗使中朝關係再次惡化, 並成為使中國再次研究對北韓核武問題的認知和政策的契機。最終中國對於北

³⁹ 第二次核子試驗之後, 一般人中對於此事的爭論主要在人民網的強國論壇中能發現 <http://bbs.people.com.cn/>。

⁴⁰ 〈各國專家們提出的解決北核問題辦法〉,《聯合新聞》, 2010 年 3 月 23 日。

⁴¹ Linbo Jin, "North Korea's Nuclear Paradox,"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

韓第二次核子試驗表示「堅決反對」的立場，並且贊成並參與比第一次核子試驗（1718 號）更強有力的聯合國制裁決議案（1874 號）。中國認為北韓是想通過兩次核子試驗確立其核武持有國的地位，也擔心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爆發「中國責任論」。從而使中國國內認為必須轉變現存包容北韓的政策主張得到支持，並且在黨、政部門和學界也展開關於調整對北韓政策的內部討論。

尤其是中國領導層在 2009 年 7 月 15 日召開由胡錦濤主持關於北韓核武問題的「黨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會議，從 7 月 17 日開始二十天期間在北京召開的駐外公館長會議中，在前、現任北韓大使和外交部長參加的情況下例外地進行了中國對北韓政策的內部會議。⁴² 但是，因為中國領導層考慮到中朝關係的歷史性和北韓的安全、戰略價值仍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以堅決維持對北韓包容為政策之基礎。即北韓的行動對中國雖然是一種戰略負擔，但仍然肯定其作為戰略資產的價值，在這個現實基礎上，中國領導層決定漸近的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從這個結論可以看出中國領導層在所謂「傳統派」和「國際派」的爭論中暫時堅持「傳統派」的立場。

最終，中國沒有根本上改變北韓政策，反而更致力於緩和美國與北韓的矛盾與對立，以及促成對話。並且中國認為就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其單方面的作用有限，為降低北韓的不確定性，美朝關係必須正常化，「美國責任論」和「美國角色論」逐漸占上風。中國這種立場在 2009 年 7 月召開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在施壓和對話並進的同時，必須重開六方會談，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上達成妥協。這是認為該對北韓舉鞭子的美國的立場，與主張通過對話解決的中國的立場相互妥協的結果。

⁴² 第二次核子試驗以後在關於中國對北政策的內部會議中，有關北韓和韓半島問題第一，北韓的現實利益是在於維護北韓體制還是無核化；第二，從中長期的角度，韓半島的統一是不可能的，對此應採取怎樣的立場；第三，北核問題最終是處於美國和中國的世界戰略衝突的地理位置，今後應該堅持怎樣的政策；第四，在維護北中兩者關係和中國責任大國的政策基礎中，哪一個應該作為第一位的概念等展開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討論。

⁴³ 之後中國為重開六方會談再一次積極發揮說服北韓的仲裁者的作用。2009年8月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訪問北韓時，會見北韓六方會談的首席代表外務省副相金桂寬，9月國務委員戴秉國向金正日傳達胡錦濤的親筆函。10月溫家寶總理訪北韓時與金正日委員長會談，得到了北韓有條件的回歸六方會談的承諾，使一直停擺的六方會談起死回生。

由此可知，中國在北韓的兩次核子試驗之後確定將「北韓核武問題」和「北韓問題」分開應對的方針。即現實上很難阻止北韓的核武裝，與其惡化與北韓的關係，使其走向更難控制的地步，長久的說，不如通過其他途徑從中施加壓力，通過持續強化與北韓的關係、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的優先政策。但與其說最終中國對於北韓核武問題以「積極的清道夫」角色出現，倒不如說是更傾向於「現實的管理者」的立場。並且比起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維持與北韓的關係更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判斷。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堅持這種立場也有美國方面的因素。中國認為在北韓核武問題中，最主要的當事者仍然是北韓和美國，所以只有美國更積極的站出來解決問題，中國才不需要站在美國前面。過去的例子如印度核子試驗時，中國也採取強烈反對甚至一度中斷和印度的交流，但最後美國庇護印度，反而將中國視為對抗戰線的一員。並且北韓核子試驗後，美國也多次發言，似乎承認其作為核武持有國。也就是說，美國也認為難以完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所以將「北韓核武問題」和「北韓問題」分開應對。深知這一點的中國雖然清楚北韓的核武對自身的安全是個威脅，但也認為沒有必要單方面順應美國要求，站在壓迫北韓的第一線。

伍、中國認知變化與政策的持續

胡錦濤時期，中朝關係在極其多樣和複雜的局面中展開。這其中雖然

⁴³ 金興圭，〈戰略性競爭中的戰略合作；美·中關係變化和在韓國的含意〉，《中蘇研究》，第33卷第3期(2009年)，頁34-35。

存在多種複雜的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北韓核武問題。尤其兩次北韓核子試驗將在變化的中朝關係推向兩國關係變化的「臨界點」。然而第二次核危機以後，中國對北韓的「認知變化」達到最高，但最終沒能與有意義的「政策變化」聯繫起來。中國認為為解決北核問題，與其失去北韓這個戰略性資產或承擔北韓崩潰的未知局面，不如穩定的管理中朝關係，同時發揮國際影響力，這樣對國家利益更有幫助。

中國提出朝鮮半島穩定和防止事態惡化的同時安撫北韓，著力於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中國的態度就如同一隻腳踩在國際社會對北韓制裁的潮流裏，另一隻腳則代表抓住處於困境的北韓，然後拱手交出的令人困惑的立場。中國認為不管怎樣北韓的崩潰對東亞局勢的穩定都不會有任何幫助，萬一金正日退位，後繼者究竟是否會放棄核武也是未知數。所以，雖然中國對北韓試圖核武裝化感到強烈的擔心和不悅，但通過外交和對話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對所有相關國家都有利，並且堅持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和應對方案的立場。

中國今後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強調與北韓仍是盟友關係。並且極可能在任何時候都將有關北韓生存的問題看成是自身的根本利益。雖然中國面向大國，比起看重北韓，漸漸更重視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規則，但中國仍然不得不將北韓看作一張「戰略牌」。中國的立場是基於自身對東北亞局勢和國際利益的戰略判斷得來的。在北韓立場上，傳統友邦中國的援助幾乎是體制生存的必須條件。所以中國和北韓的傳統關係，在實際變化中，也不得不以現實利害得失為基礎維持合作關係。